

研究論文

# 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 台灣、美國、中國大陸的三地比較

林南 陳志柔 傅仰止

林南 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Oscar L. Tang Family講座教授；陳志柔（聯繫作者：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院社會學所; jaychen@sinica.edu.tw），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及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本文資料源於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台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追蹤研究」（2005-10）；本項研究於執行過程中，接受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之經費支持，本文的資料分析主要由李思穎協助完成，謹此致謝。同時作者也感謝本文審查人的具體意見。

收稿日期：2010/02/04，接受刊登：2010/10/11。

## 中文摘要

本文研究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地社會關係的不同模式，及由此導致個人獲取社會資本差異的影響過程。我們採取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測量社會資本，並呈現社會關係在三個社會所呈現的模式差異，如親屬關係、工作關係、機構關係、朋友關係等。經濟結構（工業化及市場化）、文化與社會制度、政治經濟體制等因素，可能可以解釋這三地社會關係的類型差異以及因此導致的社會資本取得的過程。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美國、中國大陸具有不同的社會關係類型。在美國，工作關係、朋友、親屬關係在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基本上彼此分立、涇渭分明；其中，相較於工作和親屬關係，朋友關係對於獲取較好的社會資本有最強的作用。中國大陸的社會關係顯示多重關係交織的脈絡：朋友、親屬、同學、同鄉等關係相互交織，且值得注意的是，朋友並沒有成爲獨立的社會關係類型。台灣的社會關係類型介於美中兩者之間：朋友是社會關係的獨立類屬，但還是和親屬關係存在某種程度的交集。研究資料顯示，經濟結構（工業化及市場化）的解釋觀點，相較於「文化／社會制度」或「政治經濟體制」的解釋，比較能解釋我們所呈現的社會關係類型及作用的跨社會差異。同時，它們也揭示了華人社會文化的持續影響力以及文化與社會變遷的緩慢過程。另外，本文也呈現華人社會的「關係」內涵以及「同質互動」（homophily）社會機制的影響力。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網絡、關係、跨國比較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Soci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of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an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Chih-Jou Jay Che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Yang-Chih F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how social relations show differential patterns and exert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accessing social capital in three societies: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mploying data from the position generator, a measure of social capital, we discerned different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hree societies, such as kin ties, work ties, friends, and other ties. Three possible explanations are posed for assessing possible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social capital across the three societies: economic structur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socio-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s. Our results indicate different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hree societies. In the U.S., work ties, friends, kin ties, and other ties are distinctive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 Friends and other ties, rather than work ties or kin ties, exert stronger effects on accessing better social capital. In China, kin ties, friends, and other ties are interrelated, and share effects on accessing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kin ties,

friends, and other ties still overlap but to a lesser extent than they exhibit in China, and the relative effect of kin ties on social capital, while still persisting, has eased up relative to the effects of work ties, friends, and other ties. We suggest that these patterns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an economic-structure explanation than a socio-cultural or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 explanation. In addition to suggesting a slow but persistent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data also shed light on the nature of guanxi in Chinese societies, and on the prevalence of the social principle of homophily transcending developmental or economic processes.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guanxi,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 一、前言

本文研究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三地社會關係的不同模式，及由此導致個人獲取社會資本差異的影響過程。我們採取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測量社會資本，並呈現社會關係在三個社會所呈現的模式差異，如親屬關係、工作關係、機構關係、朋友關係等。我們以經濟結構（工業化及市場化）、文化與社會制度、政治經濟體制等三個解釋因素，試圖解釋這三地社會關係的類型差異以及由此影響社會資本取得的過程。

社會資本意指鑲嵌於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可以為個人所用（Lin 1982; Lin 1999）；更具體而言，社會資本也可以說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在市場場域中被期待有回報的投資」（Lin 2001: 3）。所謂的「市場場域」（marketplace），包括經濟的市場、政治的市場、或社區的人情交換市場。個人或特定社會群體得到經濟利益、或享有社會聲望、達到心理的滿足，往往不能完全由經濟資本或人力資本單獨解釋，必須納入社會資本的影響歸因。既有文獻關於社會資本的理論論述及經驗資料，多已闡明社會資本對於個人的社會流動（如求職、工作酬勞、升遷等，Lin et al. 2009; Flap and Volker 2008; Moerbeek and Flap 2008; Smith 2008）、組織表現（如團隊協調和企業文化，Erickson 2009; Bekkers et al. 2008; Hsung and Lin 2008）、集體行動（如社會運動、互助行為，Tindall and Cormier 2008; Andersen and Robteutscher 2007）、家人照顧或身心健康（Galaskiewicz et al. 2009; Fu 2009）等，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社會資本是解釋這些經驗現象的重要變項。

既然社會資本是源於個人的社會網絡，那麼問題的焦點是：「什麼樣的」社會網絡？不同社會之間，其社會網絡的性質、組成有何差異？

而社會網絡的性質如何影響社會資本的內容？個人所在社會的文化規範、社會組織、制度環境等結構因素，會制約影響個人的社會交往和網絡型態，一方面文化價值規範了人們的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選擇，但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變化（工業化、經濟發展、人口構成、政治經濟制度等），也會影響人們的互動與關係形式（Blau and Schwartz 1984）。因此，本文擬以跨社會比較，呈現經濟結構、文化與社會制度、政治經濟體制等因素，如何影響了社會網絡模式及社會資本獲得過程。

## 二、社會資本的概念測量及操作化

在概念上，個人的社會資本意指鑲嵌於個人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但當問題的焦點落實到社會資本的操作定義、指標建構和概念測量時，卻有不同的主張和作法；究其因，是基於各自不同的理論興趣和觀察角度。以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而言，目前最常見的測量方法主要可分為定名法（name generator）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兩種。<sup>1</sup> 定名法的使用歷史較久，從1970年代起，從事人際網絡、社區研究、社會支持研究的學者，在研究操作上，以受訪者的朋友或特定交往對象（如借貸、休閒網絡等），測量其網絡資源（例如，Laumann 1973; Fischer 1982; Fischer and Shavit 1995）。1980年代起，美國GSS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採用「討論網」的問題型式，詢問受訪者最近跟哪些人「討論重要的事情」，並追問這些人跟受訪者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個人特質

---

<sup>1</sup> 晚近部分學者提出「資源定法」（Resource Generator），測量個人接觸擁有特定資源者的程度和差異性，例如，是否認識某人「會修理車」、「知道很多政府規定」、「會幫忙照顧小孩」等等。這個測量法的理論預設和操作邏輯比較接近定位法（Van der Gaag and Snijders 2005; Van der Gaag et al. 2008）。

（性別、教育、職業）等。由此，可以測出受訪者的自我認知的核心網絡，而這個核心網絡的結構特質可以呈現個人的社會資源特徵（Burt 1984）。這種測量方法有時候會失之主觀，難以建立客觀的比較；且在操作上需要長時間及好耐心，它的測量效度也缺乏檢驗（Marsden 1990, 2005）。即便如此，定名法對於瞭解個人的自我中心網絡（Egocentric Networks），是很恰當的測量工具，也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例如個人的情感性網絡（如交心、傾訴悲傷苦悶等）、工具性網絡（如借貸、求職、訊息）、以及政治討論網絡等（Marsden 1987; Mcpherson et al. 2006）。這類自我中心網絡往往是強聯繫，跟個人的家庭、工作等角色互動息息相關，且受限於受訪者的主觀認知回憶，它可能僅僅反映個人特定面向的社會關係。以華人社會為例，定名法近年來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友誼網、社會支持網、社交網、情感性與工具性網絡等（Bian 2001; Ruan et al. 1997; Lai 2001；張文宏 2006；陳東升、陳端容 2002；傅仰止 2002；熊瑞梅 2001）。

跟定名法不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測量不是讓受訪者自己提出關係他者，而是就事先設計好的一組職業，代表特定的社會位置和社會資源，由受訪者是否能接觸到這些資源，測量其社會資本的質量。定位法的使用始於1986年（Lin and Dumin 1986），它提供社會資本一個標準化的測量工具（Lin et al. 2001; Lin and Erickson eds. 2008）。在現代社會中，職業位置承載了主要的社會資源，是社會資本的主要載體。個人是否認識熟人從事某個特定職業，代表個人可以透過社會連接觸到那個特定的社會位置及其蘊含的社會資源。定位法讓受訪者回答認識哪些職業人員，由此測量受訪者可以接觸到的社會資本的含量和多元性。

同時，定位法可以測量行動者經由何種社會關係，接觸到某項社會

資源。這些社會關係性質有助於彰顯社會關係如何提供獲取社會資本的路徑。不同的個體可能使用不同種類的社會關係；不同社會之間，使用社會關係的種類和模式，也會有所差異，從而展現了處於社會關係中的個體如何決策及行動，也呈現結構和制度如何影響個體行動。另外，這些社會關係類型，也揭示了社會中哪些類型的社會關係更有助於獲取社會資本。就跨國比較而言，社會關係使用類型的差異性，可能是特定的社會結構或制度因素所導致；例如工業化、文化或政治制度，都可能影響社會關係運行模式的差異。

定位法不但透過實證研究獲得效度和信度檢驗（van der Gaag et al. 2008; Fu 2008），也提供相對客觀而普遍適用的測量工具，得以有效評估社會資本的回報或後果。這項測量工具可以呈現透過社會關係獲取的社會資本的類型和程度，呈現社會資本對於個人生命機會、社會活動、身心健康的影響後果，由此就可以對社會資本在不同群體和不同社會中獲得的回報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Chen 2006, 2009; Lin et al. 2009）。

### 三、定位法的測量和關係性質

在問卷訪談的操作上，典型的定位法會先提出一個職業列表（約10至20個各類職業，視個別問卷設計而定），詢問受訪者「有沒有認識的人從事這些職業」（這些人包括親戚、朋友、熟人，即互相知道彼此的名字或彼此認識）。這個職業列表的職業項目在不同問卷之間並非一成不變，但基本的構成原則是具有代表性，包含地位聲望量表的不同等級職業及合理的變異性；且最好優先考慮那些在勞動力市場中較普遍的職業，也必須考慮特定社會群體的職業（如性別不平衡的職業）。

定位法和定名法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定位法並不去探討關係建立的



背景和基礎，但定名法會從特定面向的關係出發（例如，情感關係、工具性交換關係、討論關係等），是以自我為核心的網絡。此外，定位法的焦點是社會等級中的社會位置，而不是等級中的個人行動者。定位法測量個體行動者在社會等級中可以接觸到不同職業位置的程度。基於職業是社會資源的最佳指標，因此定位法是社會資本——即透過社會關係所獲得的資源——的理想測量工具。定位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估計社會資本的取得和途徑，它的有效性建立在所選取的職業樣本們（1）是否反映了各類社會資源？（2）是否反映了該社會職業母體的範圍？只要符合這兩個要項，定位法的效度就會符合要求。

相對於定名法，定位法測量的社會關係較不會集中於強連結（strong tie）；但定位法也無法完全避免測量焦點集中於強連結。例如，在實際訪談中，當受訪者在一個抽樣職業中認識多個熟人時，往往被指示以「最先想起的那個人」為先；這樣做的優勢是效率（易回答），但如此容易導致測量到的是強連結而非弱連結，畢竟強連結容易最先出現於個人腦海中。<sup>2</sup> 因此，定位法並沒有排除在抽樣職業中偏向強連結。但另一方面，樣本職業若涵蓋合理的範圍將會增加弱連結入列的可能性。此外，我們應該瞭解，由於人們對於強連結對象有較多的瞭解和較頻繁的接觸，因此對於個人社會資本網絡的個人特質，也可能出現偏向強連結的情形。

在典型的定位法調查中，當受訪者告知在樣本職業中有認識的人

---

<sup>2</sup> 另一個方法就是讓受訪者盡可能地列舉她／他所知道的在某個抽樣職業中工作的所有熟人，並隨機抽取其中的一個。然而，對於一般的社會調查而言，這種方法效率很低（費時且很容易導致受訪者厭倦）。當然，最好能執行一個探索性的研究，選擇少數但又有代表性的樣本，以上述「隨機抽取」方法作密集訪談，由此衡量使用「最先想到者」策略造成的誤差範圍。

時，也就是表示受訪者和位處該社會位置上的社會資源有連結、有關係，接著就是探討這個職業者的個人特質、以及關係連結的性質；具體的問卷問題可以包括：（1）受訪者和該職業者的角色關係（如：配偶、父母、同事、老闆、好朋友、普通朋友……等等）；（2）該職業者的人口特質（如性別、教育、種族）；（3）受訪者是否透過配偶介紹認識該職業者；（4）彼此認識時間有多長；（5）彼此的熟悉或密切程度（非常密切、密切、一般、不密切、一點都不密切）。

定位法的分析焦點集中於受訪者可接觸到的該職業者的個人特質，以及受訪者和該職業者的關係性質。因此，定位法的資料不僅能顯示個體延伸出去的結構，同時也能呈現個體連結到這個結構性位置所使用的社會關係；由此顯示過程中的仲介（agency）——也就是個體在社會結構制約下所作的社會關係選擇。也就是說，定位法將「資本」同時賦予「結構」和「仲介、選擇」的意涵。就總體結構而言，定位法反映了資本鑲嵌在社會結構中；就個體而言，定位法呈現資本鑲嵌於個人的選擇仲介網絡中。

#### 四、社會關係模式跨國差異的探索性解釋

我們將如何呈現社會關係處於結構制約下的選擇與仲介的性質？如何處理它們跨社會間的差異？在本研究中，我們認為所有社會中的社會關係大都是建立在共通的基本原則上，如先賦特質（ascribed attributes）、友誼、機構因素（institutional attributes）。具體而言，先賦特質所建立的關係包括性別、族群、家庭親屬等。家庭親屬關係的面向包括核心家庭（配偶、父母和子女）以及其他親屬關係，並且可能擴展到「擬似」家庭關係（意即某些被認為是家庭關係的社會連結，

如結拜兄弟、「乾」爹媽、「乾」兄弟姊妹等）。友誼也有深淺之別（Granovetter 1973）。機構因素所建立的關係包括工作關係、同窗與校友關係、宗族與同鄉關係、社團成員所建立的關係、居住地的鄰居關係等等。

一個社會的社會關係性質和模式，可以從以上的諸多要項組成的社會關係呈現出來。例如，在某些社會中，朋友關係可能是核心的社會關係；而在其他社會中，文化的（親屬或類親屬）或機構的元素可能是核心關係的組成要項。一個元素是否是社會關係的「核心」要項，可以根據其在社會關係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影響資源的取得或維繫——即社會關係的預期回報來判斷。社會資本的跨國研究，可以提供絕佳機會探討不同社會之間，運用社會關係獲取資源的模式是否有所差異（Lin and Erickson eds. 2008; Hsung et al. eds. 2009）。如果跨國差異真的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哪些潛在力量可以解釋或制約這三地的社會關係模式。在此，我們提出三個探索性的因素，解釋社會關係運作模式的跨國差異。

第一個解釋因素是經濟結構的差異，如工業化及市場化，及它們的相應過程，如勞動分工、城市化和人口流動。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過程，呈現了親屬關係趨向核心家庭，且親屬關係逐漸不是社會關係的核心要項；同時，機構連結從先賦關係（如氏族關係）轉向後天自我建構關係（如工作關係）。與此同時，城市化及工業化的過程中，朋友關係也可能發生兩方面的變化：一方面更為普遍性，且逐漸分離於親屬連結與體制連結，也就是說，朋友關係可以獨立於文化和體制關係之外，脫離它們的制約；另一方面，朋友關係的強度及範圍越來越擴大。在傳統社會，朋友關係附屬於親屬血緣關係和體制關係；例如，結拜兄弟、同宗、同鄉才會進入個人生活圈，成為「朋友」。但在現代社會，朋友就是朋友，不必因為親屬或體制關係而發展成朋友，甚至朋友逐漸取代

血緣關係及體制連結，成為社會關係的核心（Fischer 1982; Bian 1994, 2000; Hwang 1987）。鑑於美國、台灣和中國的經濟結構及工業化過程存在明顯差異，我們可以假設這三地的社會關係的模式會因而受到影響。也就是說，朋友在美國的社會關係處於重要地位，在中國處於次要地位，而台灣介於兩者之間。<sup>3</sup>

第二個解釋因素是文化與社會制度。依據傳統華人社會的「差序格局」，家庭內外的區分是社會關係的關鍵因素。非血緣關係只有在被納為大家庭的一份子，成為類家庭成員，才可能進入社會關係的核心（Fei 1992）。體制關係（如宗族、校友關係、工作關係）也必須轉化為類家庭關係，才會變得穩固重要。鑑於傳統華人社會以家庭關係為核心，我們假設：親屬關係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非常重要，但在美國並非如此。在傳統華人社會，非親屬關係只有被納入親屬關係的一環時，才會變得重要。同時，考慮台灣和中國同處華人文化的脈絡中，相對美國而言，台灣與中國大陸彼此社會關係模式的相似性，是否高於二者之一與美國的社會關係模式的相似性，將是測量文化影響力的指標。

第三個解釋因素是政治經濟體制。就政治經濟制度而言，美國和台灣是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中國則處於一黨專政的市場轉型。由此推論，我們可以假設台灣的社會關係模式會更接近美國而非中國；台

---

<sup>3</sup> 此處以經濟結構及工業化，作為解釋美中台三地社會關係可能的差異。既有社會學文獻中，工業化導致個人角色多元化及職業專業化的過程，學者多有論及；如馬克思對工業革命及工業制度的論述、Tonnie在「社區與社會」的觀點，以及Simmel對都市生活的描述。「現代化理論」也論及現代化對社會化過程及「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和專業化的影響，角色和地位，以及人際關係也由特殊主義走向普遍主義（Eisenstadt 1966）。但本文並沒有預設現代化理論的其他立場，例如「現代化是一個趨同化、不可逆轉、進步」的過程，或現代化是社會各領域「徹底的、系統的」轉變過程。

灣的親屬關係和體制聯繫相對的會逐漸喪失原先的重要性，而朋友關係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且朋友關係與親屬關係和體制關係（如工作、校友和鄰居）的重疊性降低，彼此逐漸分離。

在這三個解釋因素中，可能不是一個解釋成立，而是兩個解釋成立。例如，經濟結構和文化／社會制度的解釋可能同時存在。例如，在台灣，普遍性的朋友關係可能逐漸成型，但這個社會還是維持長久以來的家庭和類家庭關係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類家庭關係以及朋友關係共同建構成爲社會關係的核心。我們並沒有理論的預設來預測哪一個解釋因素比較有效力，我們讓經驗資料來驗證這些解釋多大程度能夠成立。

## 五、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台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追蹤研究」。該計畫以社會資本爲核心議題，在台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各進行兩波問卷調查訪問。台灣、中國大陸的調查以面訪進行，美國則採電話訪問。三地於2004年進行第一次調查，並於2006年進行第二波追蹤研究（panel study）。本研究的資料來源爲三地調查的第一波資料。

美國地區的抽樣和訪談從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進行。受委託的調查公司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簡稱CATIS），對美國21歲到64歲的成年人進行隨機電話調查。<sup>4</sup> 隨著調查的進展，我們發現，少數族群（尤其是非洲裔

---

<sup>4</sup> 正式電話訪問從2004年11月持續到2005年8月。當電話接通時，訪員先瞭解是否該住戶居住人員符合受訪要求。如果多於一人符合樣本要求，就以出生日期最接近7月

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 的回答率低於白人。為確保少數族群在樣本中具有合理的代表性，我們採取了額外的取樣標準，以增加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樣本數，以求最後的成功樣本數在各族裔人口比例接近人口普查的族裔分布。為了估計和控制因取樣方法調整所帶來的誤差，我們在統計分析中設置一個虛擬變項（名為quota），將它納入所有的分析。結果顯示，由取樣方法調整導致的誤差非常小，甚至微不足道。

美國地區最終完成3,000份成功樣本，訪問成功回答率為43%。本文的研究樣本只採用目前有全職工作者，計2,317份；排除目前不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樣本，如：失業者、退休者、學生、家庭主婦等群體。研究樣本中的性別比例男稍多於女（52%比48%）；平均年齡41歲；平均教育年數15年；在現職的平均工作年資為9年。在族裔背景方面，70%的樣本是非拉丁裔白人，非洲裔、拉丁裔、亞裔、原住民的比例依次為12%、13%、3%、1%。在婚姻狀況方面，64%的受訪者已婚，22%的受訪者沒有婚姻經驗，12%的受訪者離婚（表1）。

台灣地區的調查於2004年進行，在全島範圍內，對21-64歲的成年人進行入戶面訪。抽樣操作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簡稱PPS）抽出受訪者。<sup>5</sup> 最後取得3,280份成功樣

1日者為先。如果沒有符合要求的人選，則繼續下一輪電話訪談。平均每個電話訪問為34分鐘。大約30%接通電話的人符合要求並且願意接受訪談。這個比率稍低，但基本上接近典型電話調查的經驗（大約為35%）。那些符合要求並且願意接受訪談的人的成功回答率為43%。調查時間從週一到五的下午5：30到晚上8：45；週六從上午10點到下午2點（當地時間）。

<sup>5</sup> 實際抽樣執程序如下：利用羅啓宏（1992）「台灣省鄉鎮發展類型之研究」，依據人口特性、商業發展、公共設施、財政狀況、地理環境等相關指標，將台灣各鄉鎮分為七層，再加上台北市、高雄市、省轄市各為一層，共計十層。在抽樣時，

表1 三地研究樣本的特質分布（納入分析的在職樣本）

	美國 N = 2317	台灣 N =2406	中國大陸 N = 2701
性別（百分比）			
男	52%	59%	53%
女	48%	41%	47%
平均年齡（標準差）	41（10）	40（11）	37（9）
教育程度（百分比）			
高等教育	61%	43%	54%
高中職	32%	34%	24%
初中教育或更低	4%	23%	22%
教育年數			
平均數	15	13	12
標準差	3.4	3.6	3.2
婚姻狀況			
沒有結過婚	22%	26%	14%
已婚有偶或同居	64%	69%	83%
離婚	12%	3%	2%
現職			
平均工作年數	9	10	11
標準差	8	9	9
平均年收入	22,500-25,000 （美金）	360,000-480,000 （新台幣）	12,000-14,000 （人民幣）
種族（百分比）			
白人	70%		
非洲裔	12%		
拉丁裔	13%		
亞裔	3%		
美國原住民	1%		

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數，依其人口數比例來分配各分層欲抽出之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而抽取一定數目的鄉鎮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數之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所選的村里中再同樣依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

本，回答率為48%。研究樣本由2,406個在職樣本組成，不含家庭主婦（佔原樣本13%）、學生（佔原樣本8%）、退休人員（佔原樣本4%）和未進入勞動力市場者。研究樣本中男性多於女性（59%比41%）；平均年齡40歲；平均教育年數13年；在現職的平均工作年資為10年。

中國大陸的調查也是以21-64歲的成年人為對象，抽樣範圍為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採取分段系統隨機抽樣的方法。在初始階段，從按照城市排列的所有家戶名單中，抽取一定的家戶群，最終從167個城市中抽取了184個家戶群。<sup>6</sup> 第二階段的入戶面訪於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進行，訪員確定樣本戶中所有符合受訪者資格者，選擇生日最接近6月30日者為受訪樣本。本次調查取得3,500份成功樣本，回答率為36%。偏低的回答率由幾個原因造成，首先是嚴格的方式選取受訪者且沒有使用替代樣本，且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對於調查訪問的排斥性升高。假如多次嘗試聯繫受訪者均沒有聯繫上或者沒有進行訪談，則該次訪談就視為失敗。在中國從事社會調查，近年來的實踐經驗顯示有諸多挑戰必須克服（邊燕杰、李路路、蔡禾 2004）。低回答率所產生的效應很難估計，但根據中國人口普查資料，本項調查的全國城市樣本特質，與人口普查資料的人口特質十分吻合，由此我們相信，本項調查的樣本代表性是可靠

---

<sup>6</sup> 抽樣的初始階段，將城市地區的所有家戶排序，基本的抽樣單位為19個連續家戶。理想的樣本規模為3,535，以便有足夠的子樣本對子群體（如性別、宗教等等）進行分析。由此確定抽樣間距並隨機抽取初始單位。受訪者家庭戶群的城市分布如下：上海（5群，95個家庭戶 / 受訪者）；北京（4群，76個家庭戶 / 受訪者）；重慶（4群，76個家庭戶 / 受訪者）；天津（3群，57個家庭戶 / 受訪者）；武漢（3群，57個家庭戶 / 受訪者）；瀋陽（2群，38個家庭戶 / 受訪者）；廣州（2群，38個家庭戶 / 受訪者）；成都（2群，38個家庭戶 / 受訪者）；以及全國其他159個城市（每個城市1群，19個家庭戶 / 受訪者）。



的。<sup>7</sup>

扣除沒有現職訊息的樣本，中國大陸的研究樣本有2,701個，不含家庭主婦（佔原樣本4%）、學生（佔原樣本10%）、退休人員（佔原樣本9%）。研究樣本中男性多於女性（53%比47%）；平均年齡37歲；平均教育年數12年；在現職的平均工作年資為11年。就現職的所屬產業部門而言，56%的受訪者在國有企業工作，9%的受訪者在集體企業就業；對照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其中職業產業部門的相應比例為58%國有企業和7%集體企業。由此可見，本項調查的研究樣本和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彼此有高度的吻合。

## 六、變項測量

在台、美、中三地的調查訪問，我們採取定位法來測量個人的社會資本。訪談時，定位法的問題敘述如此展開：「請問在您所有認識的人裡面，有沒有是現在正在做下列這些工作的？」問卷中的抽樣職業表列舉了22個職業，訪員從職業表的第一個職業開始詢問起，若受訪者有認識的人從事該職業（表示受訪者可以接觸到該職業位置承載的資源），訪員接著詢問這個人跟受訪者的關係、他／她的性別、種族（只

---

<sup>7</sup> 我們以「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為參照，該次人口抽樣調查的執行為2004-05年，與本文調查時間相符。該次人口調查的城市男性人口為53%；本調查最後樣本男女比例分別為49.4%和50.6%，研究樣本的男性人口比例是53%。全國人口調查的城市年均收入的中位數為10,493元，區間為10,000-14,000元，與全國樣本頗接近。以職業部門為例，如正文所述，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城市就業人口中，58%在國有企業，7%在集體企業；本調查有56%的受訪者在國有企業工作，9%的受訪者在集體企業就業，分布上也接近全國統計數字。「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的資料來源源自：<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2005/renkou.htm>。

用於美國問卷)、以及受訪者跟他/她「彼此認識幾年了?」、「有多親近?」。<sup>8</sup> 這22個職業是從「標準國際職業聲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簡稱SIOPS)的職業列表中抽取,從高聲望職業(如教授、律師)到低聲望職業(如清潔工、搬運工),我們也選取在勞動力市場中較常見的職業,以便一般人都瞭解題意。三地問卷的職業彼此有些微差異,部分原因在於用語及翻譯,部分原因在於某些職業不同時存在於三地社會(如,「國會議員」、「立法委員」)。三地的抽樣職業列表,以及它們的聲望分數,詳見附錄1。<sup>9</sup>

根據受訪者對於職業列表的認識情況,參考該職業的SIOPS聲望分數,我們建立社會資本指標的三個面向:達高度(upper reachability,能接觸到的職業中,聲望分數最高者)、廣度(extensity,能接觸到的職業的總數)、範圍(range,能接觸到的職業中,聲望分數最高與最低之間的差距)。在這篇文章中,由於範圍和其他兩個指標高度相關,爲了

---

<sup>8</sup> 在訪談中,訪員讓受訪者瞭解,所謂「認識的人»,包括親戚、朋友和熟人,必須是「可以互相認出及叫出對方的稱呼」(例如:老王、張大同、李小姐、林經理……等),如果只有一方面叫得出對方,這樣並不算認識。若認識的人裡面,多於一人從事這一職業,則以「先想到的那一位爲準」。受訪者跟該職業者的關係,有27個選項,詳見附錄。就關係連結的親近度而言,受訪者從五個測量尺度(非常密切、密切、一般、不密切、一點都不密切)中擇一。操作上,我們將「非常密切和密切」兩類,歸爲「強連結」;將「不密切和一點都不密切」兩類,歸爲「弱連結」;位居中間的「一般」類沒有歸類,在統計中作爲參考類別(reference category)。美國的調查有種族的變項,包括白人、黑人、拉丁裔、亞裔、土著和其他。

<sup>9</sup> 在中國大陸的樣本中,我們增加了三個政治性職業(即:單位領導、上級主管單位領導、公務員),由於本文以三地比較爲重點,在分析上沒有納入這些職業。其次,中國的「單位領導」並沒有「標準國際職業聲望量表」的分數,無法納入社會資本「達高度」和「範圍」的測量,但它們的確可以納入社會資本「廣度」的測量。

避免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我們只使用了達高度和廣度這兩個指標。

## 七、社會資本的關係性質

表2顯示三地的社會關係廣度（能接觸到的職業的總數）和特徵。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平均接觸職業數目（廣度）分別為7.43、7.52，平均數相近；但台灣為9.15，明顯高於美國和中國大陸。這可能是因為台灣勞動力市場中男性的比例相對較大（台灣調查中男性佔59%）。在另外執行的相關性檢定中，就男性和廣度之間的相關性而言，美國、中國大

表2 社會資本廣度的分析——關係網絡中職位的個人特質

	美國 N = 2317	台灣 N = 2406	中國大陸 N = 2701
能接觸到的職位數目			
平均數	7.43	9.15	7.52
（標準差）	(4.09)	(5.45)	(4.62)
職位者的性別（平均數與百分比）			
男性	3.87 (52%)	5.48 (60%)	4.94 (66%)
女性	3.56 (48%)	3.67 (40%)	2.58 (34%)
職位者的種族（數目與百分比）			
白人	5.17 (70%)		
黑人	0.96 (13%)		
拉丁裔	0.76 (10%)		
亞裔	0.16 (2%)		
美國原住民	0.03 (0%)		
關係強度（數目與百分比）			
強連結	3.75 (50%)	3.72 (41%)	3.42 (45%)
一般	2.16 (30%)	4.37 (48%)	3.26 (43%)
弱連結	1.52 (20%)	1.06 (11%)	0.84 (12%)

陸和台灣，其相關係數分別為-0.8、0.12、.00；也就是說，台灣樣本中更多男性的存在並沒有造成較高的廣度值。比較可能的解釋是台灣與美國、中國大陸的國土規模和都市化程度差異，台灣社會由於地小、人口稠密、都市化程度高，因此一般人日常生活中能接觸到的各類職業者，高於土地大、生活單純的美國，以及都市化程度相對低的中國大陸。

社會資本的承載者，也就是調查中受訪者能接觸到的職業者，性別是否有男女差異？在美國，平均接觸到的7.43個職業者，男女各為3.87個和3.56個，沒有顯著差異；在台灣，平均接觸到的9.15個職業者，男女各為5.48個和3.67個；在中國大陸，平均接觸到的7.52個職業者，男女各為4.94個和2.58（表2）。在另外執行的相關性檢定中，男性和使用男性關係之間的相關係數，美國、台灣、中國大陸的分別為0.09、0.28、0.26，由此顯示美國社會「同質互動」（homophily）的程度，低於台灣和中國大陸。所謂「同質互動」，意指人們傾向於與自己相同背景、興趣和價值觀的人互相往來，例如，男性偏向使用男性的社會連結。我們發現同質互動的效應在中國大陸最為明顯，因為運用性別關係的偏態選擇（運用男性關係和女性關係分別為4.94和2.58）不能被樣本中的性別分布所解釋（在中國大陸樣本中，男性和女性受訪者比例基本上相近）。由此，我們可以做出初步結論：美、中、台三地社會，性別同質互動的運作程度有相當差異。

在美國社會，所運用的社會關係中（即：受訪者能接觸到的職業者），白人關係佔70%，黑人關係佔13%，拉丁裔關係佔10%（表2）。對照樣本的種族分布（白人為70%，黑人12%，拉丁裔佔13%），比例頗相近，似乎呈現種族的同質互動。我們測量受訪者自身種族類別和使用的種族關係之間的相關性時，發現白人運用白人關係的相關係數為0.56，黑人運用黑人關係的相關係數為0.76，拉丁裔使用拉丁裔關係的

相關係數為0.70，顯示種族的同質互動的確存在。相對於白人族群，種族的同質互動在黑人和拉丁裔族群中，運用更為普遍。也就是說，在美國社會，種族的同質互動隨著種族不同而有差異；雖然白人的比例遠高於黑人和拉丁裔，但黑人和拉丁裔比白人更傾向於通過同種族接觸社會關係中的社會資本（即不同的職業）。

上述發現證實了一個共識：同質互動的影響力高於人口結構的效應。然而，在不同的社會中，同質互動在不同的面向展現。在台灣和中國大陸，性別同質互動很顯著，但美國不然。在美國，種族的同質互動很強。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假設：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社會分化可能是沿著性別界線展開；但在美國，則沿著種族界線展開。<sup>10</sup>

接下來，我們分析三地強弱關係連結的類型。如表2所示，在美國、台灣和中國大陸，運用強連結（非常密切和密切）的比例分別為50%、41%和45%；弱連結分別為20%、11%、12%；強弱之間的一般連結分別為30%、48%、43%。由此觀之，相對於台灣和中國大陸，美國人更傾向於使用強連結和弱連結；相對於美國人而言，台灣人和中國大陸人更傾向不運用弱連結（比例為1：2）。我們由此可以推論：強連結在這三個社會中都普遍地被運用，並且遠遠超過弱連結的使用。這可能反映了強連結「強」的本質，表示一般人的社會關係連結，傾向於社會關係較密切的對象。

可能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美國比台灣和中國大陸更經常運用弱連結：工業化和文化影響。如上所述，工業化帶來了鬆散的家庭關係和更強的一般人之間的連帶；而華人文化也可能導致對強連結的更多依賴。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來釐清這兩個論點。

---

<sup>10</sup> 表2中有關種族同質互動的分析，只有美國的分析，我們也曾執行台灣和大陸的族群同質分析，但並沒有呈現族群同質的現象。

表3 美國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

關係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因素7
	工作	父母	配偶	遠關係	朋友	舊關係	手足/親屬
配偶	0.0557	-0.1264	0.6306	0.1723	-0.0195	-0.1811	-0.0105
父母	0.0235	0.6851	0.036	0.1457	-0.1215	-0.13	0.2235
配偶父母	0.0772	0.1768	0.6782	-0.1512	0.0205	0.0662	0.0228
子女	0.0929	-0.5922	-0.0488	0.1157	-0.1294	-0.0503	0.3638
兄弟姊妹	0.0935	0.0877	-0.2132	-0.0892	-0.0855	-0.1954	0.6159
其他親戚	-0.1253	-0.0173	0.2669	0.1093	0.1781	0.1737	0.6219
現在的鄰居	0.0579	-0.2523	0.1137	0.6197	0.0686	-0.1008	-0.2551
老師	0.3006	0.2383	0.0108	0.0341	0.1668	0.4832	-0.0793
現在的同事	0.6658	0.018	0.1351	0.0094	-0.0758	-0.0474	-0.0883
現在的上司	0.6046	-0.1853	0.0034	-0.0116	-0.0246	-0.0322	0.1472
以前的同事	-0.035	-0.1209	-0.0436	0.0546	-0.1457	0.7494	0.0113
好朋友	0.0237	0.0051	-0.0035	0.0533	0.7898	-0.1087	0.0142
普通朋友	-0.211	-0.1548	0.0684	-0.1549	0.4745	0.1687	0.0602
因對方的工作而認識的	0.5332	0.1167	-0.0105	0.0109	0.1282	0.2716	-0.0432
熟人	0.2971	0.0144	-0.2675	0.0824	0.3029	-0.1515	-0.0282
間接關係	-0.0234	0.1826	-0.0715	0.7493	-0.0048	0.1247	0.1531

註：原選項含28類社會關係（詳見附錄2），分析時剔除少於5%者選擇的社會關係類型；採用主成分分析法，直角旋轉。

表4 台灣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

關係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因素7
	工作	遠關係	朋友	同學/父母	鄰居/子女	手足/親屬	舊關係
配偶	-0.0712	-0.0714	-0.0897	-0.0749	0.3686	0.3737	0.2735
父母	-0.0162	-0.2796	-0.1411	0.5507	0.1669	0.0887	0.0534
子女	-0.0697	-0.1738	-0.0811	-0.0036	0.5954	0.0317	0.009
兄弟姊妹	-0.029	0.033	-0.0704	-0.0172	-0.0646	0.7704	0.06
其他親戚	0.0612	0.1238	0.4001	0.1489	0.1786	0.5036	-0.1953
以前的鄰居	0.0749	0.4196	0.1541	-0.1131	0.3334	-0.2173	0.3157
現在的鄰居	0.0475	0.1671	0.0504	0.0063	0.6315	-0.0464	-0.0572
同學	0.0861	0.0947	0.0831	0.5103	-0.2156	0.0644	0.2227
老師	0.3679	0.0483	0.0997	0.4953	-0.2117	-0.0652	0.1837
現在的同事	0.7348	0.0259	-0.1108	-0.0053	-0.0028	-0.0061	-0.1643
現在的上司	0.7004	-0.0325	-0.0488	0.0465	0.0185	-0.0242	0.0634
以前的同事	-0.0715	0.0168	-0.0465	0.0952	-0.0018	0.0224	0.7950
客戶	-0.3292	0.1216	-0.0859	0.4464	0.131	-0.2245	-0.3333
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	-0.2114	0.5200	-0.1402	-0.0832	-0.1297	0.0715	-0.0476
好朋友	-0.0209	-0.0425	0.7008	0.0016	0.0683	0.0579	-0.0649
普通朋友	-0.1738	-0.0781	0.6646	-0.0535	-0.1358	-0.1305	0.0504
因對方的工作而認識的	0.0696	0.6513	-0.091	0.0137	0.0289	0.0691	-0.015
間接關係	-0.0259	0.4497	0.0027	0.3883	0.0446	0.1305	0.0709

註：原選項含28類社會關係（詳見附錄2），分析時剔除少於5%者選擇的社會關係類型；採用主成分分析法，直角旋轉。

表5 中國大陸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

關係	因素1 遠關係	因素2 工作	因素3 親戚/ 朋友	因素4 同學/ 宗族	因素5 鄰居	因素6 舊關係/ 普通朋友	因素7 普通朋友/ 老師	因素8 配偶
配偶	-0.0094	0.0051	-0.0032	-0.0230	0.0247	-0.0059	-0.0443	0.9280
父母	0.1193	0.0141	-0.5605	0.0877	-0.1921	-0.0464	0.1516	0.2357
兄弟姊妹	-0.0260	-0.0167	0.1428	0.0620	-0.0358	0.0579	-0.7619	0.0885
其他親戚	0.1346	0.0945	0.6249	0.0010	-0.0161	0.0660	-0.1784	0.1394
以前的鄰居	0.1169	0.0505	0.0903	0.1599	0.5895	-0.0078	-0.1424	-0.0758
現在的鄰居	-0.0679	-0.0184	-0.0051	-0.0529	0.7657	0.0489	0.0853	0.0747
同學	0.0064	0.0266	0.0647	0.7569	-0.0383	-0.0318	0.0246	-0.0468
同鄉	0.0063	-0.1098	-0.1923	0.6090	0.1090	0.0019	-0.1543	0.0015
老師	-0.0116	0.4803	0.0997	0.2717	-0.0453	0.2339	0.3126	0.1639
現在的同事	-0.0289	0.7148	0.0162	-0.0210	-0.0672	-0.1405	-0.1834	0.0107
現在的上司	0.0131	0.6730	-0.0486	-0.0824	0.1080	-0.0007	0.1403	-0.0496
以前的同事	0.0379	-0.0962	0.0763	0.0046	0.0995	0.7478	-0.0015	0.0021
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	0.6814	-0.0876	-0.0309	-0.1403	0.0468	-0.0496	0.0579	0.0856
好朋友	-0.1480	-0.1639	0.3844	0.0153	-0.2019	-0.2740	0.0555	-0.0644
普通朋友	-0.0526	-0.1300	0.3697	0.0006	-0.2016	0.3552	0.3820	-0.0138
因對方的工作而認識的	0.6825	0.0582	-0.0131	0.0638	-0.0761	-0.0058	-0.0242	-0.1401
熟人	0.1014	-0.1353	0.3553	0.1443	0.1840	-0.4667	0.2976	0.0793
間接關係	0.5382	0.0058	0.1335	0.2082	0.0219	0.1699	0.0026	0.0651

註：原選項含28類社會關係（詳見附錄2），分析時剔除少於5%者選擇的社會關係類型；採用主成分分析法，直角旋轉。



## 八、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模式

在訪問進行中，當受訪者告知在樣本職業中有認識的人時，訪員會問他們彼此是什麼關係（如：配偶、父母、同事、老闆、好朋友、普通朋友……等等），答案卡中有28種關係供受訪者選擇（見附錄2）。如果受訪者與其有多重關係，則選擇最重要的社會關係類型。為了獲得更簡潔的關係類別，我們採用因素分析法，試圖將28種關係變項，化約成少數潛在變項（共同因素）。我們剔除那些低於5%的人選擇的關係變項，對其餘的關係變項進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選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進行直角旋轉（rotated orthogonally），由此得出三個社會中社會關係的因素負荷量（表3、表4、表5）。<sup>11</sup> 美國的資料最後選取了七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包含三個高負載量的社會關係，即：同事、上司，以及「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我們稱此為「工作」。第二個因素的高負載量關係包括：父母、子女（係數為負），我們稱為「父母」。第三個因素包括配偶和配偶父母，稱之為「配偶」。第四個因素，包括間接關係和鄰居，稱為「遠關係」（distant ties）。第五個因素包括好朋友和普通朋友，以及熟人，稱為「朋友」。第六個因素包括以前的同事、老師，為「舊關係」（previous ties）。第七個因素包括兄弟姐妹和其他親戚，稱為「手足／親屬」（表3）。

表4是台灣的因素分析結果，同樣產生七個因素。有些因素和美國

---

<sup>11</sup> 因素名稱基本上闡明了每一個因素的高負荷量類別。它們代表每個因素的字面意思或者潛在意思。因素的排序部分反映了測量法中相似類別的多寡，而不是實質重要性的排序。對於類別變項或虛擬變項，集群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比較合適。但當變項數夠多時，因素分析和集群分析的結果會很接近。

相似，如工作、朋友、手足／親屬、舊關係和遠關係。台灣獨特之處在於：有些親屬關係和非親屬關係互相交織；父母、同學和老師共用一個因素；子女和鄰居也落在同一個因素。我們很難精確解釋台灣這些重疊的關係，但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台灣的親屬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某些非親屬關係（如學校和鄰居）密切相關的，但美國的親屬關係和非親屬關係基本上是分立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配偶關係沒有和任何因素存在高負載關係，這也和美國的情況不同（表4）。

中國大陸的因素分析呈現八個因素。和美國及台灣類似，它也有工作關係、親屬關係（配偶，親屬）、舊關係和遠關係。不同於美國和台灣的是：朋友關係交織在親屬和非親屬關係之中，並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因素。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情況相似之處是：親屬和非親屬關係存在某種程度的重疊。但是，和台灣不同的是，中國大陸的配偶自身是一個顯著的因素，它獨樹一格成爲一個關係類別。同宗及同鄉是一個重要的關係類別，並且和同學共同組成一個因素（表5）。

表6概括了三地的各種關係類型。我們主要從四種基本類型對三地的社會關係進行比較：工作關係、朋友、親屬關係和其他關係。這三個社會有一個共同點：工作關係明顯獨立於其他關係類型。在美國，朋友很明顯是獨立的社會關係類型，獨立於家庭和其他關係。在台灣，朋友也顯示爲一個獨立的因素，但是「其他親屬」在朋友這個因素有相當的負載量，暗示著親屬關係和朋友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交。在中國大陸，朋友始終不是一個獨立因素；它和親屬、舊關係以及老師高度相交。由此顯示，在中國，朋友重要的原因是因爲他們同時是親屬和其他關係的一部分。

在美國，親屬關係和其他關係也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它進一步分化爲三種類型：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親屬、配偶姻親的親屬關係。在

表6 社會關係的類型

	美國 N = 2317	台灣 N = 2406	中國大陸 N = 2701
社會關係 (因素)	工作 朋友 姻親/配偶 手足/親屬 父母	工作 朋友  手足/親屬 同學/父母 鄰居/子女	工作 普通朋友/老師 配偶 親戚/朋友  同學/宗族 舊關係/普通朋友 鄰居 遠關係
	舊關係  遠關係/鄰居	舊關係  遠關係	

註：特徵值 (eigenvalue) 大於1的因素進行直角旋轉的主成分分析。

台灣，也有三種明確的親屬關係：父母、子女和其他親屬。但是，配偶和姻親並不組成一個獨立的親屬類型。配偶可部分歸類於「子女」組或者「手足/親屬」組。姻親並沒有在這個列表中（沒有達到5%的選擇率）。而且，台灣的親屬關係和非親屬關係是相互交織的。例如，同學和父母重疊，鄰居和子女重疊。在中國大陸，親屬關係就不如美國或者台灣那樣截然不同。配偶是一個獨立的親屬關係，而其他的親屬關係是和其他關係相互交織的（如同學和鄰居）。

除了工作關係、親屬關係、朋友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同學、鄰居和親屬關係是交織在一起的；在中國大陸，同學/同鄉和鄰居分別成為獨立的因素；在美國，鄰居關係和親屬關係是不相干的，鄰居關係是遠關係的一部分（和間接關係同一因素），且同學關係並不在列表上面（沒有達到5%的選擇率）。因此，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老學及鄰居關係，顯然對一般人是重要的社會關係，且中國大陸的同鄉關係也很重要。

簡而言之，美國的社會關係模式傾向於「純」一些，即工作、朋友和親屬關係大致上是相互獨立的場域。相對的，中國大陸的社會關係則顯示多重關係交織的複雜場景。在中國大陸，人們經常將朋友、親屬、同學、同鄉交織在一起；重點是朋友並沒有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關係類型。相反的，某個程度上而言，中國大陸的朋友關係是親屬關係的一環，朋友在口語中常被稱爲「兄弟」，是家庭的擴展；其他一些更邊緣的朋友是舊關係的一部分。台灣則處於美中之間，朋友開始成爲社會關係的獨立類屬，但還是和親屬關係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交；同學、鄰居關係則交織在親屬關係之中。<sup>12</sup>

由因素分析所形成的指標變項，彼此的獨立性和重疊性始終是操作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例如，遠關係在台、美、中三個社會，指涉的關係型式有所差異。其實，不只「遠關係」，其他因素（如鄰居）也有類似問題。這是使用因素分析形成指標常會遇到的問題。我們能做到的，首先就是標示清楚，使讀者不誤會，在表7、表8我們明列了該關係類型（如「遠關係」、鄰居）包括的項目，不同社會之間，有所差異，但也多有重疊。其實，英文和中文之間（甚至台灣和大陸之間），縱使同一個名詞，也可能有不同意涵，這是跨國比較及問卷測量的限制。研究者能作的，就是告知每個因素（指標）在形成中，包含哪些項目，並說明爲何將不同項目的因素，給予同樣命名；因爲我們判斷它們在比較中，是指涉極爲相近的社會關係（如遠關係），彼此仍有可比性。不同的項目被歸爲同一個因素，反映了這些項目被「認爲」是相似的，指涉同一個概念；但也可能因素分析的歸類有點突兀，這是研究者必須解

---

<sup>12</sup> 在問卷操作上，台灣問卷中沒有「熟人」這一選項，爲了檢查是否因爲台灣沒有「熟人」選項而影響分析結果，我們嘗試在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因素分析中剔除了「熟人」選項。結果顯示，並沒有顯著差異，上述的研究發現和解釋仍舊成立。

釋，也是因素分析最被詬病的弱點。<sup>13</sup>

## 九、社會資本的取得

上節我們呈現美中台三地社會關係的差異模式，緊接的議題就是這些關係模式是否導致接觸到不同的職業，亦即取得不同的社會資本。我們採用社會資本的兩個指標：達高度（能接觸到的職業中，聲望分數最高者）和廣度（能接觸到的職業的總數）；達高度代表社會資本的富足性，廣度意指社會資本的多樣性。首先，對社會資本的達高度和廣度，以及其他所有變項（如：所有社會關係因素、性別、強弱連結，白人連結）進行簡單相關分析（zero-order correlations）。刪除無相關或者弱相關（相關係數低於.10）的變項，然後將社會資本的達高度和廣度作為迴歸分析的依變項，其餘的變項作為解釋變項。<sup>14</sup>

表7提供了三個社會中社會關係特質變項在預測社會資本達高度的迴歸分析結果。前三欄是美、中、台各自的標準化係數，由此呈現解釋變項的相對影響力，絕大部分的係數都呈現統計顯著性。表7的欄（1）至欄（3）顯示三地各自的迴歸模型，在美國的社會關係類型中，朋友

---

<sup>13</sup> 除非我們不使用因素分析，不然這個問題一定存在，這是一個研究工具的取捨的問題。我們無法在本文中，詳細討論名詞、歸類、認知的跨國差異，但這是社會科學測量與操作化中時刻要銘記並處理的問題。我們只能盡力而為。希望本文的基本發現，也有助於呈現不同社會之間，對於社會關係概念認知與指標使用的同異性。

<sup>14</sup> 唯一的例外就是男性關係和女性關係。它們在廣度和達高度上都很顯著。但是，這兩個變項彼此高度相關，如果同時置於一個迴歸分析，會形成多元共線性。基於此，我們建立了二個獨立的模型：一個模型納入男性關係，而另一個納入女性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將所有其他變項都考慮進去的時候，男性關係和女性關係對依變項都有顯著貢獻。此處我們只報告男性關係的模型，因為它的影響更大。

表7 社會資本達高度迴歸分析的標準化係數及跨社會比較

	(1)	(2)	(3)	(4)	(5)	(6)
	美國	台灣	中國大陸	美國 VS 中國大陸	美國 VS 台灣	台灣 VS 中國大陸
工作關係	.05	.19	.13	+	+	+
朋友關係	.15	.13	.04	+		+
手足/親戚 配偶	.03	.08	.14	+	+	+
學校關係		.20	.11			+
鄰居（現在的、以前的）			-.01			
遠關係	.03	.15			+	
舊關係（以前的同事、老師）	.08					
男性關係	.27	.34	.35			
強連結	.08	.06	.11			+
弱連結	.10	.09	.06			
白人關係	.11					
抽樣檢查	.01					
調整後判定係數	.33	.45	.39			
N	2280	2344	2675			

註：1. 表中數據為標準化迴歸係數；除了美國的「遠關係」和中國大陸的「鄰居」以外，所有係數皆為顯著，即 $p < .001$ 。

2. 「朋友關係」變項：美國為「好朋友、普通朋友、熟人」；台灣為「好朋友、普通朋友、親戚」；中國大陸為「普通朋友、老師」。
3. 「學校關係」變項：台灣為「同學、老師和父母」；中國大陸為「同學、同鄉」。
4. 「遠關係」變項：美國為「現在鄰居、間接關係」；台灣為「以前鄰居、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因對方工作而認識、間接關係」。
5. 欄（4）、欄（5）、欄（6）是以兩個社會迴歸模型各自迴歸係數和標準差，作Ttest比較，瞭解它們彼此迴歸係數和標準差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代表存在顯著差異。

是獲取更富足社會資本的最重要關係類型；舊關係有中等的影響力；但學校關係和鄰居關係都沒有顯著影響。在台灣，學校關係、工作關係、朋友和其他關係（如遠關係、親屬）都很顯著。親屬連結在台灣確有相當影響力，但親屬和其他社會關係交織。在中國大陸，工作關係、親

屬關係（兄弟姐妹和親屬）、學校關係（同學和同鄉）具有相當影響力。朋友和親屬關係、其他關係存在重疊，也顯示中等程度的影響。比較三地，可以發現美國人傾向於使用弱連結（朋友和其他關係）獲取更高的社會資本，而中國大陸人使用各種類型的關係，包括工作關係、親屬關係和其他關係。台灣人也使用各種關係類型，但相對於大陸人而言，親屬關係的影響力有所降低。在所有的社會關係變項中，男性關係是獲取富足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相對於美國人和台灣人而言，強連結在中國樣本中更為重要。

表8呈現社會關係特質變項在預測社會資本廣度（多樣性）的迴歸分析結果。在美國，學校和鄰居關係的影響力並不顯著，而朋友仍是獲取多樣性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台灣，朋友關係及遠關係的影響力比較明顯。在中國大陸，親戚的影響力最大；其次是工作、朋友、學校關係、同鄉等都有作用。簡而言之，就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被運用來獲取不同的社會資本。三地都有透過朋友關係來獲取多樣性社會資本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地中，男性關係在提供多樣性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對大陸人和台灣人更是如此。相較而言，美國人和大陸人更為依賴強連結提供多樣性的社會資本。其實強連結在這三個社會中都普遍地被運用，並且遠遠超過弱連結的使用。但針對強連結對多樣性社會資本的影響，在美國和中國大陸比在台灣更多，反映了人際聯繫密切的對象，能提供更多樣的社會資源。為何台灣跟美中有差異，一個可能的思路是，台灣地小人稠，反而強弱連結的影響力，不若幅員廣闊的美中兩國。

比較表7和表8的係數時，可以呈現不同類型的社會關係（如工作關係和朋友關係）對於社會資本的達高度和廣度的不同影響及跨國差異。例如，在美國，工作關係對於社會資本達高度影響力的迴歸係數0.05，明顯低於台灣的0.19和中國大陸的0.13（表7）；但美國的工作關係對於

表8 社會資本廣度迴歸分析的標準化係數及跨社會比較

	1	2	3	4	5	6
	美國	台灣	中國大陸	美國 VS 中國大陸	美國 VS 台灣	台灣 VS 中國大陸
工作關係	.10	.08	.05	+		+
朋友關係	.19	.18	.06	+		
親戚	.09	.06	.16			
配偶			.03			
學校關係		.15	.08			+
鄰居		.05	.04			
遠關係	.03	.19			+	
舊關係	.07					
男性關係	.35	.57	.58	+	+	
強連結	.27	.11	.20	+	+	+
弱連結	.15	.10	.16	+		+
白人關係	.20					
抽樣檢查	.02					
調整後判定係數	.90	.87	.87			
N	2317	2406	2701			

註：1. 表中數據為標準化迴歸係數；所有係數皆為顯著，即 $p < .001$ 。

2. 「朋友關係」變項：美國為「好朋友、普通朋友、熟人」；台灣為「好朋友、普通朋友、親戚」；中國大陸為「普通朋友、老師」。
3. 「親戚」變項說明：美國和台灣皆為「兄弟姊妹、親戚」；中國大陸為「親戚、朋友」。
4. 「學校關係」變項：台灣為「同學、老師和父母」；中國大陸為「同學、同鄉」。
5. 「鄰居」變項說明：台灣為「鄰居、子女」；中國大陸為「現在的鄰居、以前的鄰居」。
6. 「遠關係」變項：美國為「鄰居、間接關係」；台灣為「以前鄰居、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因對方工作而認識、間接關係」。
7. 欄(4)、欄(5)、欄(6)是以兩個社會迴歸模型各自迴歸係數和標準差，作Ttest比較，瞭解它們彼此迴歸係數和標準差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代表存在顯著差異。

社會資本的廣度影響力僅次於朋友關係的影響力，相對於台灣和大陸在工作關係對於社會資本的廣度的影響力就沒有那麼強（表8）。也就是說，在美國（相較於台灣和中國大陸），職場的工作關係，更有助於認識「多樣性」的社會關係，不是位居高位者。在台灣和中國大陸，職場



的工作關係，最主要的效益在於接觸到有權有勢者，不是接觸多樣人士。由此呈現的議題是，職業帶給個人在社會資本的不同面向的影響，也有跨社會之間的差異。要通達有權有勢者，在中國大陸，多須仰賴職場辦公室的通道；在美國多須靠朋友；而台灣則介於兩者之間。<sup>15</sup>

在中國大陸的樣本中，問卷中的社會資本測量增加了三個政治性職業（即：單位領導、上級主管單位領導、公務員），為此我們比較納入或不納入這三個職業，對中國大陸的社會資本「廣度」測量的改變和影響，結果發現中國地區的廣度平均數由7.52（不納入）增加到8.96（納入）。對於表8的分析比較，我們以T-test檢定中國大陸是否納入這三個政治職業，對於原本表8的係數是否有顯著影響，分析發現對原「男性關係」的係數有影響，中國大陸的男性關係係數由0.58增加到0.66，但這個改變沒有影響上述三地比較的分析和結論。基本上，這個訊息說明的是：在中國大陸，男性關係對於增強社會資本的廣度，影響大於美國；且更重要的是，政治領域的男性社會資本，對於社會資本的廣度增強更大。鑑於當今中國大陸的高官和幹部，男遠多於女，這個結果頗符合社會現象。

## 十、討論與結論

雖然只是一些初步性探討，但是以上分析呈現了社會資本嵌入不同社會結構的模式和過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區分這些社會結構：（1）社會關係的模式；（2）這些社會關係對於獲得社會資本的影響。例如，中國大陸和美國社會關係的類型和影響截然不同。就社會關係類型而言，美國的社會關係有四個明顯獨立的因素或區塊：工作關

---

<sup>15</sup> 作者感謝本文評審提出這個非常有意義的論點。

係、朋友、親屬關係和其他關係。在中國，工作關係也是一個獨立的因素，但是親屬關係、朋友和其他關係三個因素之間就相互交織，水乳交融。台灣則呈現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模式，工作關係是獨立因素，親屬關係也部分地交織於朋友和其他關係之中，但是朋友和其他關係之間並不存在重疊。也就是說，台灣的親屬關係、朋友和其他關係仍然存在重疊，但在程度上遠不如中國大陸。<sup>16</sup>

相對地，社會關係對於獲取社會資本的影響也顯現了以上的差異。以社會資本廣度（多樣性）而言，三個社會中獲取多樣性社會資本的路徑，意味著多種類型的社會關係型態。以社會資本富足性（達高度）而言，在中等工業化的中國大陸，獲取富足的社會資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親屬關係和機構關係（如工作關係、同學關係和同鄉關係）。在高度工業化的美國，獲取富足的社會資本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一般性社會關係，即朋友和其他關係，而不是親屬和機構關係（如工作關係、同學關係等）。台灣的經濟結構及工業化介於美中之間，其社會關係類型也處於兩者之間。與中國大陸相似，台灣的工作關係仍然重要，親屬關係影響也很顯著，但是不若中國大陸影響程度那麼深。台灣仍然依賴親屬和機構關係；朋友關係也逐漸重要，但是這種關係跟親屬關係有著某種程度的重疊或很難區分清楚。對於這種現象，文化與社會制度的解釋可能更為合適，因為我們所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差別是親屬關係重要性的

---

<sup>16</sup> 台灣版的問卷，當初在問卷設計時，沒有列「熟人」的關係選項。為此，我們執行統計檢定，將美國（表3）和中國大陸（表5）的「熟人」去除，看看少了「熟人」是否有影響。在美國部分，去除熟人（acquaintances）後，好朋友和普通朋友仍然很強地聚在一個因素上，沒有明顯改變。在中國大陸，也沒有改變原先好朋友和普通朋友的因素位置。最重要的是，在表7和表8，去掉「熟人」之後，並沒有改變原先的結論。所以，基本上，台灣問卷少了「熟人」一項，不致於影響原先的統計推論。

逐步減退和朋友關係重要性的逐步顯現。政治經濟體制的解釋似乎比較薄弱，因為就社會關係的類型而言，台灣並沒有跟美國更接近。

以美國和台灣而言，經濟結構的改變，如工業化及市場化，與社會分工、城市化和社會流動同步，由此的確會鬆動根深蒂固的空間限制和制度框架，也為普遍性的社會關係開啓大門。朋友關係，現在已經獨立於親屬和機構關係，是獲取更好社會資本的路徑，而且成為個人社會網路中弱連結和遠關係的關鍵組成。

雖然我們強調工業化的解釋，但是並沒有漠視文化及社會制度的持續影響力。以美國這個移民社會而言，先天上即不具備氏族傳統和地方認同，人口的歷史傳統和組成特質，可能促成美國社會形成「少親屬、靠朋友」的文化模式。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社會關係類型呈現了親屬關係的持續影響力。不同於工作關係，台灣的親屬關係雖然在獲取富足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上有所緩和，但是仍然是社會關係的關鍵部分。儘管過去30年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中國為削弱舊文化的影響作了全面的嘗試，家庭也處在單位制和住房控制的高度制約下，然而，核心家庭之外的親屬關係仍然存在並且繼續發展。經歷了超過40年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之後，以及因為1949年部分人口遷移到台灣而造成的家庭解體，台灣社會的親屬關係仍然是社會關係的核心部分。

中國大陸以及台灣（雖然程度較輕微）社會關係的持續型態，為我們提供「關係」在華人社會更確切的內涵（金耀基 1988；King 1985；Hwang 1987；Lin 1989；Bian 1994；Bian & Ang 1997；Bian 2000；Ruan 1998）。我們的研究資料顯示，華人社會的「關係」，混合了先賦關係和後天建構的關係，包括親屬、宗族、學校和工作關係。這些關係互相交織、互相依賴，形成了關係類型的兩個中心層——延伸家庭和擬似家庭；其他的關係類型則是邊緣的、非直接的。朋友並不獨立於這些關係

而存在，而是嵌入於這些關係之中。朋友只有在被視為延伸家庭的一份子時才具有顯著性。就如台灣社會一樣，關係——親屬、機構關係和朋友的混合體——將會隨著工業化的歷程而變化。關係並不會輕易地消失（或許永遠都不會消失），因為這種交織重疊的社會關係（即便不是親屬關係）形成了強韌的社會連結。這種社會連結的韌性和強度，在日常生活和危機來臨時為個人提供了工具性支援和情感性支持。

因此，認為工業化會帶來更理性計算的社會關係，未必正確。在美國，性別和種族 / 族群這兩種社會關係仍然相當重要——男性關係和白人關係在獲取更好社會資本時有相對的優勢。不論工業化的程度高低，同質互動仍持續成為支配社會組成與成員互動的強有力機制，它的主導性甚至凌駕經濟發展或政治變遷所產生的社會機制，因此，同質互動呈現的結構性制約仍是社會學研究核心的關鍵議題。

## 作者簡介

林南，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Oscar L. Tang Family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通信研究員；曾任美國社會學會副會長（1999-2000）、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2003-08）。研究興趣包括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及醫療社會學。

陳志柔，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及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及社會衝突、社會資本、經濟社會學。目前透過社會抗議新聞資料庫分析當代中國集體抗爭的趨勢和模式。

傅仰止，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社會網絡、社會資本、都市社會學。目前研究透過大型調查與接觸日誌資料，探討日常接觸的背景變異與社會功能。

## 附錄1 定位法的抽樣職業

職業	國際職業 聲望分數	美國	台灣	中國 大陸
國會議員	85	v	v	
教授	78	v	v	v
律師	73	v	v	v
大企業老闆	70	v	v	v
生產部門經理	63	v	v	v
中學老師	60	v	v	v
人事主管	60	v	v	v
作家	58	v	v	v
護士	54	v	v	v
電腦程式設計師	51	v	v	v
大公司行政助理	49	v	v	v
會計	49	v	v	v
警察	40	v	v	v
農夫	38	v	v	v
櫃臺接待	38	v	v	v
工廠作業員	34	v	v	v
美髮師	32	v	v	v
計程車司機	31	v	v	v
警衛	30	v	v	v
保母	23	v	v	v
清潔工	21	v	v	v
搬運工	20	v	v	v
(單位領導)				v
(上級主管單位領導)				v
(公務員)				v

## 附錄2 關係的各種選項

- 1 配偶（現在的或以前的）
- 2 父母
- 3 配偶父母
- 4 子女
- 5 兄弟姊妹
- 6 媳婦
- 7 女婿
- 8 其他親戚
- 9 以前鄰居
- 10 現在鄰居
- 11 同學
- 12 同鄉
- 13 老師
- 14 學生
- 15 現在同事
- 16 現在上司（包括老闆）
- 17 現在下屬
- 18 以前的上司、同事或下屬
- 19 客戶
- 20 工作上認識的其他人
- 21 同宗教團體
- 22 同社團
- 23 好朋友
- 24 普通朋友
- 25 因對方的工作而認識的
- 26 網友
- 27 熟人\*
- 28 間接關係（透過其他人認識的）
- 29 其他

\*台灣沒有熟人的選項

## 參考書目

- 金耀基，1988，〈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頁319-345，收錄於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冠。
- 陳東升、陳端容，2002，〈跨族群政治討論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學》4: 119-157。
- 張文宏，2006，《中國城市的階層結構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傅仰止，2002，〈個人網絡中他人間聯繫強度的結構性原理〉。《台灣社會學》3: 235-281。
- 熊瑞梅，2001，〈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頁179-216，收錄於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編，《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方法與發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羅啓宏，1992，〈台灣省鄉鎮發展類型之研究〉。《台灣經濟》，第190期，台灣省政府經建會。
- 邊燕杰、李路路、蔡禾，2004，《社會調查實踐：中國經驗及分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Andersen, Jorgen Goul and Sigrid Bobteutscher, 2007, "Small-scale Democracy: Citizen Power in the Domains of Everyday Life." Pp. 221-254 in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Jan W. van Deth, Jose Ramon Montero, and Anders Westho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ekkers, Rene, et al., 2008, "Social Networks of Participant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p. 185-205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an, Yanjie, 1994, "Guanxi and the Allocation of Jobs in Urban Mainland China." *China Quarterly* 140: 971-99.

Bian, Yanjie, 2000, "Getting a Job Through a Web of Guanxi in Urban Mainland China." Pp. 225-253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Boulder, CO: Westview.

Bian, Yanjie, 2001,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Pp. 275-295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Bian, Yanjie and Soon Ang, 1997,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Mainland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3): 981-1006.

Blau, Peter M. and J. E. Schwartz, 1984, *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Burt, Ronald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4): 293-339.

Chen, Chih-Jou Jay, 2006, "Elite Mobili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Issues & Studies* 42(2): 53-83.

Chen, Chih-Jou Jay, 2009, "The Distribution and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 in Taiwan." Pp.193-215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isenstadt, Shmuel N., 1966,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Erickson, Bonnie H., 2009, "The Context Challenge: Generalizing Social

Capital Processes Across Two Different Settings.” Pp. 93-114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ei, Xiaotong, 1992,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 Translation of Fei Xiaotong’s Xiangtu Zhongguo,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by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scher, Claude S. and Shavit, Yossi, 1995,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network density: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Networks* 17(2): 129-45.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lap, Henk and Beate Volker, 2008,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apital and Job Attainment: The Position Generator as a Measure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Pp. 65-80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 Yang-chih, 2008, “Position Generator and Actual Networks in Everyday Life: An Evaluation with Contact Diary.” Pp. 49-64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u, Yang-chih, 2009, “The Immediate Returns on Time Investment in Daily Contacts: Exploring the Network-Overlapping Effects from Contact Diaries.” Pp. 327-347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alaskiewicz, Joseph, Beth M. Duckles and Olga Mayorova, 2009, "Childcare Networks and Embedded Experiences." Pp. 299-326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80.

Hsung, Ray-May,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eds., 2009,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sung, Ray-May and Yi-Jr Lin, 2008, "Social Capital of Personnel Managers: Causes and Return of Position-Generated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p. 234-54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wang, Kwang-kuo,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74.

King, Ambrose Y. C., 1985,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in Confucianis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Pp. 57-70 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ited by Donald J. Munro.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umann, Edward O.,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s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Wiley.

Lai, Gina, 2001,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Urban Shanghai." *Social*

*Networks* 23(1): 73-85.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 131-45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Beverly Hills, CA: Sage.

Lin, Nan, 1989,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5: 59-129.

Lin, Nan, 1999,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22(1): 28-52.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Nan and Mary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4): 365-85.

Lin, Nan and Bonnie Erickson, eds., 2008,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 Nan, Yang-chih Fu and Ray-May Hsung, 2001, "The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Pp. 57-82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Lin, Nan, Dan Ao, and Lijun Song, 2009, "Produc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Pp.163-192 in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L. Brei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cpherson, Lynn Smith-Lovin and Matthew Brashears, 2006, "Social Isolation in America: Changes in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ver Two

Deca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3): 353-75.

Marsden, Peter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 122-31.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435-63.

Marsden, Peter V., 2005,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etwork Measurement.” Pp. 8-30 in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J. Carrington, John Scott and Stanley Wass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van der Gaag and Tom Snijders, 2005, “The Resource Generator: Social Capital Quantification with Concrete Items.” *Social Networks* 27(1): 1-29.

Martin, van der Gaag, Tom Snijders and Henk Flap, 2008,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 Social Capital Measures.” Pp. 27-48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 Lin and B.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erbeek, Hester and Henk Flap, 2008,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ir Effect o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through the Life Course.” Pp. 133-156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an, Danching, 1998, “The Content of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iscussion Networks: An Exploration of General Social Survey Discussion Name Generator in a Chinese Context.” *Social Networks* 20 (3): 247-64.

Ruan, Danching et al., 1997, “O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Social Networks* 19(1): 75-89.

- Smith, Sandra Susan, 2008, "A Question of Access or Mobilization? Understanding Inefficacious Job Referral Networks among the Black Poor." Pp. 157-181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ndall, D. B. and Jeffrey J. Cormier, 2008, "Gender, Network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The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Network Diversity for Environmentalists in British Columbia." Pp. 282-307 in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edited by Nan Lin and Bonnie H. Erick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